



河北省出版史志
资料选辑

河北省出版史志编辑部

河北出版史志资料选辑

第七辑

3

1990

河北出版史志资料选辑

第七辑

(1990年第3期)

河北省出版史志编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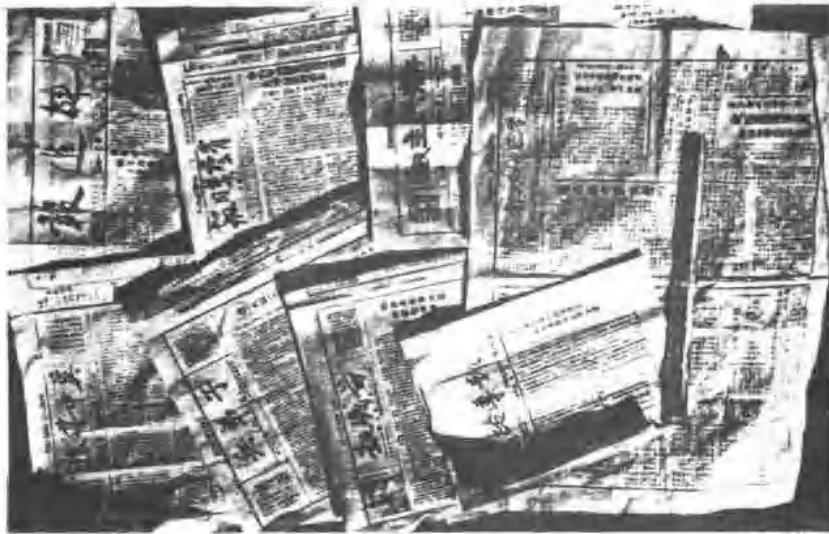
晋察冀画报社1942年在平山县碾盘沟用自制照相机制版。



1948年12月至
1949年8月，华北
解放区的三联书店
——新中国书局在
石家庄营业。图为
吴玉章题署的新中
国书局门面（详见
资料选辑第五辑）。

(左) 这是晋察冀边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出版的部分刊物。

(右) 这是晋察冀边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出版的部分报纸。



目 录

晋察冀的新闻摄影和画报出版工作	罗光达(1)
关于创建华北新华书店石门分店情况介绍	赵国良(28)
回忆冀中六地委《团结报》的战斗历程	孙研之 整理(34)
关于冀晋区新华书店二分店定县门市部和望都县	
第一次建店情况的回忆	赵金明(49)
记枣强新时代书店	步进(53)
“冀南文总”出版工作片断	张会清(56)
大众美术社的建社前后	教谦(58)
华北联大的油印教材和刊物	青野(79)
解放前夕河北省的杂志社	冯敏(81)
民国时期原察哈尔省出版情况及部分著作家的著述情况	赵之恒(86)
河北书院发展概况	文弘(90)
冀县在京古旧书业琐记	常树一秉(133)
河北人在天津开设书肆简况	骆志安 摘编(141)
张家口地区出版业拾遗	谢江(146)
《广平府志》中有关出版方面的史料	王兰榜 整理(149)
《畿辅通志》中有关出版的诏谕	余晖辑(170)
清代河北几位学者及其著述	雷梦水 校录(173)
冀县张廷书和他的“聚文山房”	骆志安 摘编(184)
记古旧书事业家郭纪森	李兴荣(187)

晋察冀的新闻摄影和画报出版工作

罗光达

抗日战争时期到过解放区的许多国际友人和大后方的朋友们，对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尤其是坚持在敌人深远后方的抗战，都惊叹不已，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而当他们看到我们在物质条件极度艰难，战斗异常频繁的情况下，能在抗日根据地印刷出版以照片为主的大型画报，更觉得惊奇，认为这是奇迹中的奇迹。这种赞叹，我认为有两重意思。第一是赞叹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战争环境和物质极度艰难条件下拍摄并出版摄影画报，这是高度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共产党人的高度革命创业干劲以及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忘我献身精神；第二是赞叹中国的摄影画报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变化说明为少数人消闲遣兴的旧画报的历史结束了，为人民服务，为抗战服务，为人民解放战争服务的、人民自己的画报出世了。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晋察冀和冀热辽的新闻摄影和画报的出版工作，是如何在战斗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山沟里来了照相的

1938年12月，我从革命纪念地——延安到达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之后，由于我爱好文艺、摄影，也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将我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担任随军摄影记者。那时，沙飞同志已在军区作了一年多摄影记者。他在这

一年多时间里，拍摄了很多珍贵的新闻照片，如：《八路军铁骑兵通过平型关》、《平型关战斗缴获的战利品之一部》、《插箭岭上》、《八路军在喜峰口》、《收复察南蔚县》、《攻克涞源》、《收复浮屠峪》……等。当时军区司令部驻扎在平山县西的蛟潭庄，那是一个有二三百户人家的小镇。我初搞专业摄影工作，没有照相机，沙飞同志把公家较好的一台魏尔脱法国相机（镜头是F2.8、自动对焦，也是他经常使用的相机之一），慷慨地让给我使用。我就拿这台相机，开始在蛟潭庄和附近的村子拍摄一些有关部队生活、群众参加抗战勤务、生产等活动的镜头。晚上把睡觉的房子布置成简陋的暗室冲洗胶片。有时在白天用被子、毯子挡住门窗晒印相片。同时我和沙飞同志一起把他一年来拍摄的东西加以选择整理，洗印若干套并编写上文字说明，送到延安给党中央、八路军总部、以及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供他们作对外宣传使用。毛主席在1939年3月18日给聂荣臻同志的信中提到：“……送我的一本照片……正传观各同志。……”这本照片是用聂荣臻同志的名义送给毛主席的。

为了扩大照片的宣传作用，由沙飞设计，我们想用土办法请木匠做一架横放着可前后移动、用日光为光源的放大机。但缺少聚光镜、暗箱、放大纸及药品等，只好请管理处的同志到阜平县、陈南庄、王快镇等地有过照相馆的地方去搜集。一时放不了，我们就只好选了一些主体较大较好的照片，贴在用白报纸裱好的马粪纸上，编排成版面，写上工整的说明文字，加上花边和简单的图案，然后将装饰好的马粪纸用针线把四角缝在一匹白布上。这样拉开来就是一长条，折叠起来只有四开报纸那样大小一摞，便于携带，到各地举行巡回展览。

我们在驻地蛟潭庄举行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次新闻摄影展览。照片的内容有：八路军收复、攻克城镇；缴获敌军战利品（枪炮、大洋马、军用品等）；群众参战、部队生活；群众生产……

等。这次展出的作品大部分是沙飞拍摄的。当展出的照片在农村大庙两旁的墙上挂起来的时候，村里的驻军都整队来参观，老乡们也纷纷前来观看。我们从警卫连请来几个有些文化的青年战士，帮助作讲解员并维持秩序。前来观看的人群熙熙攘攘比赶庙会还热闹。由于大部分照片是120十六张的小照片，最大的也只是120八张的，参观的群众都想挤到前面去，好看的更清楚。年长的老大爷、老大娘也来观看，由妇教会的青年积极分子帮助照顾和解说。他们看得很认真，尤其看到照片上拍的缴获敌军战利品时，更为细致。画面上有几门炮，多少支枪，多少匹大洋马，都要数一数。有的边看边议论，指着照片互相交谈。前来观看的人们特别对攻克城镇、缴获战利品以及正规部队的照片和反映村子里群众生活的照片更加感兴趣。一下子“山沟里来了照相的”便传开了。当天下午附近的李家岸等村的群众都跑了好多里路前来参观。山沟里的老乡有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照片，就是到城里照过相的，也不知道照相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观看的人群对展览感到特别新奇，展览场地也特别热闹。

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尽管已经看过这些照片，但他听说搞街头新闻摄影展览，还是亲自前来参观了现场，直接听一听群众议论。他高兴地对沙飞和我讲，你们这样做很好，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照片。这样的形象宣传作用大，如果能放大一些，那就更好了。他听说我们正在制作土放大机很是高兴，鼓励我们早日制成。

这次新闻摄影巡回展览，是军区开展新闻摄影工作的良好开端。大约在展出的两个月之后，我们的土法放大机制作成功，于是举行了放大照片的巡回展览，收到了更好的效果。从此巡回展览和对外发稿便成为新闻摄影的两项经常性工作。每年都要对外寄发很多放大照片并举行很多次照片展览。据1941年上半年统计，由军区统一寄发到延安、重庆、晋东南、苏联、菲律宾、越

南、暹罗、新加坡等地的新闻照片有3000余张。这就加强了对外宣传工作，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坚定了全国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对抗战胜利的信心。而在边区利用各种纪念大会或在街头、部队俱乐部中举行的大、小展览会达50余次，每次都收到很好的效果。

（二）“幻想”变成了现实

利用照片对国内外发稿及在边区范围内举办新闻摄影展览，果然能起到较好的宣传教育作用，但这两种办法还是受到放大纸数量少、流动时间长等局限，不能更广泛，更及时地对广大群众和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充分发挥新闻摄影应有的战斗作用。如果能像科学技术发达国家那样采用电波传送照片和出版以照片为主的画报，或把照片制成铜版刊登在报纸上，那就可以使成千上万的读者及时看到这些新闻照片，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沙飞和我认真反复地研究思考了这两个问题，认为要用电波传送照片，那时农村没有电是根本做不到的。出版画报或将照片制版在报上发表是有可能的，但要解决照片稿子来源和制版印刷这两个问题。关于照片稿件来源虽然是个大问题，但这个问题到1941年已经不太突出。因为军区1939年春已经建立新闻摄影科，冀西的四个军分区的摄影组织已经初步建立。平西挺进军也于1939年10月建立了摄影科，有科长陈靖、摄影记者张绍村等。冀中在1940年初也成立了摄影科，科长石少华。这样就在军区范围内开始形成了一个新闻摄影网。这时分布在各分区、各部队的摄影记者和摄影员，基本上已经能够掌握新闻摄影这一工具，能及时把本地区发生的重大新闻，形象地记录下来，并经常向军区寄送新闻照片稿件和在本地区举办新闻摄影展览。为加强新闻摄影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军区政治部还制订了《新闻摄

影暂行工作条例》，使军区的新闻摄影工作日渐走向正规化、普及化。虽然，摄影网还需要健全和充实，摄影人员的工作、生活经历和战斗经验还不够丰富，新闻摄影的思想水平、艺术水平、摄影技术技巧等方面都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但是新闻摄影工作的发展，为筹建画报，已开始创造着条件。

出版摄影画报的另一个大难题是如何在战争环境中建立一个有照相制版的印刷工厂，拥有胶版或凸版印刷机，具备各种必要的化学药品及铜版、锌版、木造纸、铜版纸、上等油墨，特别是要有能操纵、使用这些设备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上述机器设备和材料当时只有上海、北平、天津等少数大城市有。有些大城市的大报纸虽有照片制版设备，但由于战时原料、药品短缺，也只能制作很少的铜版。在敌后经济文化都相当落后的农村里，哪里搞过这些机器设备、药品、纸张、油墨呢？又怎么能在战斗频繁的环境中制版印刷出版画报呢？又怎样能在敌人“大扫荡”中将这些设备、物资不遭敌人破坏而完好地保存下来呢？这些困难在有些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和难以克服的。所以当有的人听说我们要搞摄影画报，就说我们“天真”、“幻想”。他们说，能用油印、石印坚持出版小型绘画面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但是事实出于他们的意外。他们看不到我们的有利因素和主观能动作用。我们以革命的创业精神在党和军区的领导下，排除了一切困难，得到了四面八方的支援，终于把“幻想”变成了现实。

1939年夏秋，我在平西采访时，听到区党委和挺进军司令部的有关同志谈到他们准备印制钞票，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从北平动员了七、八个照像制版和印刷技术人员，其中有何重生、王丙中、徐复生、高华亭、杨瑞生、周德缘、马化民等。还从北平运出了一架照相制版机和一架八开凸版机，一架八页铅印脚蹬机以

及一部分照相制版用的药品和印刷用的油墨。但是，由于设备材料不够完备，加上经常处于战斗环境等原因，印制钞票的事一直无法进行。这些设备都坚壁在平西宛平县“野三坡”的一个小村子里。这些技术人员的工作，无法安置又不能再送他们回北平。

我曾向有关同志探询，是否有可能帮我们从北平搞印画报的设备，他们的回答说，太复杂太困难了。

1940年8月，我随部队参加百团大战，在娘子关漠河滩战斗中采访时，遇到了来前线劳军的五专署宣传队的康健，谈话中得知他过去在北京故宫印刷厂搞照相制版工作，我非常高兴，通过组织把他调到军区。后来又在华北联大周年纪念采访时遇到了边区政府搞摄影工作的刘博芳。他以前也是在北京故宫印刷厂搞照相制版工作的，和康健是师兄弟。我们设法把他也调来军区。我们向他们二人详细了解了照相制版和印刷照片画报的情况，知道与用胶版（凸版）印刷钞票的设备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向军区领导建议把闲置在平西准备印钞票的设备和人员调到军区来，以发挥这一部分人力、物力的作用。1941年初，由平西部队将上述人员和器材护送到一分区易县地区，我和康健等同志前去接运到阜平。经检查，照相制版机完好，但药品材料不全，数量也有限。尽管如此，对我们来说还是解决了很大问题，有了一个初步的物质基础。为了解决短缺药品和器材，我们走遍了军工、后勤、卫生等部门，有关领导同志和技术人员对我们要出版画报都给予很大的支持，特别是军工部及各厂答应帮助我们制造难度很大的平面铜版、锌版、三酸（硝酸、硫酸、盐酸）、纯酒精，按照晋察冀日报社铅印机的样子给我们做模型、翻铸一架八页铅印机等。冀中卫生部顾正均部长尤其热心，他除了将仓库中我们需要的药品和代用品全部拨给我们外，还要我们开出药品单子，由他们的采购员设法帮助从平津等地采购。晋察冀日报社的邓拓和出版部部长何纪云更是把我们看成兄弟单位，当作是他们自己的工

作一样，溶化上千斤铝帮助我们铸了一副新五号铅字和各号标题用铅字，还调给我们一些铅印、排字、刻字技术人员，如铅印技师彭启亮、焦卓然，排字技术工人侯培元、吕红英，刻字刘春和装订张学勤等人。这样我们出版画报的筹备工作在四面八方的大力支援下终于凑合起来了，并在1941年4月胜利地完成了照相制版的试验工作。在完成试验之后，首先在《抗敌三日刊》、《晋察冀日报》以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袖像和近百张铜版插图，继而出版了单张的对敌伪军宣传的《解放》半月画刊两期。这对加强宣传工作和对敌伪的宣传攻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由于报刊上刊登了新闻照片，使报纸刊物更加生动有力，使群众及部队更感到兴趣。在地方群众中有因制版之出现而订阅报纸者，有从铜版插图中找自己在参战中的形象引以为无尚光荣者。有人把陕甘宁的广播、晋察冀的铜版当作八路军的两大创造而加以称道。政府和分区报纸许多人要求为他们制版。《冀中导报》派专人前来商谈制版问题。更有要求开办制版训练班者。许多人认为铜版工作之完成，画报之出版，是敌后出版事业的新阶段或新纪元。

（三）我们的“供给部”在平津

《晋察冀画报》能否出版，关键在我们能不能有足够的照相制版设备和印刷材料。我们唱的《游击队歌》里，有两句非常形象的歌词：“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是靠这样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武器、弹药和给养的。我们出画报要照相制版印刷材料，同样也得靠这种办法。不过具体的做法有所不同，因为敌人的作战部队不会携带这些东西，一般情况下，敌人占据的城镇据点，碉堡里也不会有这类东西，所以在战场上是解决不了这种特殊物资

的供给和补充的。平津有这类设备和物品，但敌人列为配给品，市场上不公开出售而且把它封锁得很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唯一的办法是进入平津想办法，我们必须把我们出版摄影画报的“供给部”设在平津。

1941年夏天，我们了解到冀中军区地处平原，通往平津的水陆交通点比较多，敌人封锁的再紧也不可能像对西部山区那样严密，如果能设法从平津运东西到冀中，可能比冀西要容易一些，因此，我决定上冀中去。这个主意得到政治部和聂司令员的同意和支持，并由聂司令员亲自将这一任务当面交给正在军区开会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和政治委员程子华。于是我就和他们一起前往冀中。我们在骑兵营的护送下，在一个漆黑的夜里越过封锁沟墙，顺利地通过了平汉铁路封锁线，到了冀中大平原。

那时正是青纱帐起的季节，黎明时分，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我们骑在马上很自然地唱出了“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整个骑兵营发出嘹亮的歌声震荡着冀中平原。我用侧逆光抓拍了我铁骑兵黎明中进军在大平原上的壮丽画面。过路后不久，正赶上日寇对我开始大“扫荡”，我随军区在七、八分区一带进行了一个来星期的反“扫荡”。敌人阴谋合击我军区机关，我们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我拍摄冀中军民在反“扫荡”中的斗争。吕正操司令员在青纱帐中指挥作战等镜头就是那时候拍摄的。

冀中的反“扫荡”告一段落后，吕正操、程子华就把去平津采购照相制版印刷器材的任务当面交给了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并给他们说明了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向有关人员详细交代了所要器材的规格、性能、数量、货源等具体情况和要求。

这时，我一面搜集新闻摄影材料、拍摄军区各种活动的照片，并随地方民兵夜袭安平县城等据点。民兵们用打水井用的钢管和

自己的土办法制造的迫击炮向敌人据点射击，射出的炮弹爆炸后引起城内敌人一片恐慌。日寇在混乱中向城外无目的地打炮、用机枪扫射，一直打到拂晓。

神通广大的地下工作人员和采购员们，在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通过各种交通渠道和运输关系（包括可利用的敌伪关系），一批又一批照相印刷器材，通过敌人封锁极为严密的平津地区水路、陆路运了出来，再从游击区转运到解放区。器材运到后，后勤部门和民兵就把它作为重要作战物资，坚壁在挖得最隐蔽最可靠的地洞里面，以严防敌伪军的突然袭击。

经过三、四个月的努力，从北平和天津源源送来的器材已经和要求采集的数量差不多了，其中运来的东西中主要有照相制版用的药品，制版用的铜版、锌版，印刷画报用的木造纸、铜版纸、外国造的其中还有日本造的上等油墨等等。这些器材以及冀西已经搜集到的东西加在一起，估计足可以出版好几期画报了。如果画报不定期出版的话，这些材料用一、二年也不成多大问题。这时，冀西的冬季反“扫荡”也已取得胜利，因此我准备返回冀西，并把全部器材也随我一同运回军区。这个意见经吕正操、程子华同意后，他们派主力团的一个营护送我与这些器材通过平汉铁路封锁线，由团参谋长负责指挥。

部队出发前，营长和教导员召开了班以上的干部会及全营大会并作了战斗动员。会后把所要带走的全部器材分散给全营战士，战士们把分到的器材当作最珍贵的东西用衣服、被子、毯子认真仔细地包裹起来，以确保它们的安全。团参谋长向战士们传达了军区领导的指示，提出了“人在东西在、保证安全到达冀西”的口号。这些东西有的体积很大，如铜版、锌版、木造纸、铜版纸，有的分量很重，如油墨，有的容易碰碎，如瓶装的液体药水等。战士们巧妙地把这些东西和背包捆扎在一起，还作了急行军试验。这无疑给每个战士增加了背包的重量，但战士们都能发扬

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担负了一面准备战斗，一面运送器材的光荣任务。

在到达准备过路的村子时，正遇到唐凯也在这个村子里。他在冀中招收了几百个抗大附中学生，在一个营护送下准备过封锁线。由于他们的队伍中青少年多，缺乏作战经验，过封锁线时与敌人接触，一开火，看到铁甲车的照明灯四处照射以及打炮的时候，队伍不好指挥。他们连续三次都没能通过封锁线。而且有伤亡，唐凯自己也身负几处伤，无法行动，只好躺在担架上。这时我们决定联合行动，统一指挥，并且制订了通过封锁线的行动作战计划，如果敌人铁甲车阻碍我过路，就将它炸毁，碉堡里的敌人如果出动，坚决给予阻击或歼灭。并且选择在定县城南附近挖墙填沟强行通过封锁线。

半夜两点钟左右，掩护部队全部布置完毕，平墙、填沟工作在民兵的配合下也顺利完成，这时全体部队和附中同学开始跨越封锁线。估计敌人已知道了我们是大部队过路，因而他们不敢外出，只好龟缩在炮楼里无目的地打枪。敌人的铁甲车也沿着铁路线进进退退，与我们保持在一定距离以外，胡乱照射探照灯，并随着探照灯无目标地打枪，打掷弹筒，炮弹在空旷的野地上爆炸。估计只用了半小时左右就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我过路时是和侦察员们在一起行动，走在过路部队的最前面，唐凯的担架和我在一起过路。过路后我和参谋长一直站在路边，等待全部人马通过以后，才和后续部队一起前进。拂晓时我们到达了行唐口头镇附近，集中点收物资，送到的物资没有受到丝毫损坏。然后用大车和牲口转送到军区。

为了保证画报出版的连续性，为了能从平津源源不断把照相制版印刷材料运出来，我们先后派徐飞鸿、张玉书二同志常驻行唐口头一带的边区采购站。这是抗战时期边区对敌经济战线上的一个重要堡垒。从那里把边区的核桃、红枣等山货运出去，再把

作战物资运进来。我们有些器材就是通过采购站从平津运回来的。由于采购渠道和关系极为复杂，往往不能把货物品种、规格搞的很确切，使得有些东西长期找不到货源关系而买不进来，或者买的东西不合规格。为了使材料能及时准确地从平津运出来，我们经组织上和城工部刘仁同志的同意与支持，画报社特别派遣了一个熟悉北平照相制版和印制行业情况的王炳中同志，秘密地常驻北平。还派了一个曾在保定照相馆工作过的李鸿年作为往返于解放区和北平王炳中之间的联络员，由李将画报社急需的货单直接送给王炳中，再由王炳中通过各种关系购妥后再由地下党组织设法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运到解放区来。这样，，北平、天津名符其实地成了我们画报社物资器材的“供给部”。我们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和军区领导、特别是聂司令员的关心支持是分不开的，这是当时解决出版画报材料困难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四) 奇迹终于出现了

关于出版《晋察冀画报》的编辑方针和任务，聂荣臻司令员等军区领导同志指示：“应该是把边区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光辉事迹反映出来，以鼓舞人民更勇敢的斗争。我们的画报不仅要面向边区，面向群众，而且要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

按照上述指示，于1941年初由沙飞同志亲自抓画报的编辑工作，并调来了文学编辑章文龙、赵启贤，美术编辑唐炎等同志分头负责照片文字和美术的编辑工作。他们从几年来收集的摄影作品中选择了比较优秀的作品并向边区文联、美协、联大文艺学院、西北战地服务团等兄弟单位，组织文艺作品和美术稿件。稿件经他们初步编选以后，再经过集体反复讨论修改，最后由军区领导审定。

画报创刊号以中英两种文字出版。编好以后，请英文翻译刘

柯、李伦等同志由中文译成英文，还请班威廉、林迈可等国际友人帮助校正。

由于有些材料需要从北平运来，因此直到1942年5月1日才正式成立晋察冀画报社，由沙飞任主任，由我任副主任，同时决定把军区石印所和画报社合并，一切出版印刷任务都由画报社统一负责。我们也从平山的支角沟村迁往西面山区的碾盘沟村，为了争取《晋察冀画报》创刊号能够在敌人秋季大“扫荡”以前出版，全社紧急动员起来，以战斗的姿态，争取在抗日战争五周年把画报印出来。

画报社搬进了碾盘沟这个小山村之后，村子立刻变得活跃起来。当地老乡们尽量腾出房子让我们使用。就这样，建起铅印室、石印室、排字房、铸字刻字室、照相制版室、装订室等，一个当时看来比较现代化的印刷工厂，在这小山村里建设起来了。

发稿时首先要求放大照片能符合规格，但由于是采用天然光放大，并受到放大纸型号不全的局限，其中一部分只好用洗相纸代替。因此有时放大一张照片仅曝光就需要个把小时才能完成。负责暗室工作的张进学为了保证放大和洗印的质量并在计划时间内完成任务，他们常常日以继夜地埋头苦干。

突击出版画报时正是在炎热的夏天里，在用羊圈改装成照相制版的暗房里，闷热异常，加上空气不好，何重生、刘博芳、杨瑞生、康健等技术人员，整天在暗房里连热带熏，有的呕吐，有的甚至休克晕倒，但大家还是发扬高度的吃苦耐劳精神，坚持工作。这时正遇上自然灾害，加上敌人的“三光政策”及经济封锁，给我们边区经济造成很大困难。为了克服困难，救济受灾群众，我们只好节衣缩食，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粮食标准降低为一斤三两，每人节约出二两小米，救济灾民。我们用黑豆、瓜菜来代替主食，这样就把轻体力劳动和工作人员的每日三餐改为每日两餐，只给摇大轮的重体力维持每日三餐。因此，不少同志得了